

列宁对折中主义的批判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统一书号：2171·110

定 价：0.15 元

列宁对折中主义的批判

上钢三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哲学史班 著
复旦大学哲学系七五级马列研究班

列宁对折中主义的批判

上钢三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哲学史班
复旦大学哲学系七五级马列研究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45,000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110 定价: 0.15元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介绍列宁反对折中主义的小册子。

折中主义象僵尸一样死板，又如游蛇一样难以捉摸。它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但却以貌似辩证法的面目出现。它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地并列起来，无原则地把根本对立的立场、理论和路线机械地凑合在一起，搞合二而一，其结果是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企图使人们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折中主义是在哲学上两军对战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①。在古希腊的反动奴隶主贵族的哲学中，折中主义屡见不鲜，都是被用来为奴隶主贵族统治辩护，反对社会变革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思想家孔丘，他最早提出中庸之道，胡说什么“允执其中”、“过犹不及”、“和为贵”，鼓吹阶级调和，抹煞阶级斗争，妄图复辟奴隶制统治。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欺骗人民，反对革命，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总是乞灵于折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61页。

中主义。所以，折中主义是没落阶级的反动哲学。对此，鲁迅说得十分深刻：“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代表着日趋没落的资产阶级利益，为维护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无不拾取历史上反动阶级的折中主义余唾，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妄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①新老修正主义者都是玩弄这种手法，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使它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各个时期，折中主义经常出现、反复表演，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起着非常恶劣的破坏作用。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领导创立和巩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的革命实践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揭露了伯恩斯坦派的“游蛇”伎俩的实质是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戳穿了考茨基的“中派”假面具，还其资产阶级“看门狗”的真面貌；无情地批判了布哈林的二元论，粉碎其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

本主义的阴谋。在斗争中，列宁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为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折中主义诡辩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重温列宁批判折中主义的斗争史，对于我们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反动面目，是很有帮助的。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生死大搏斗。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完全步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后尘，顽固地坚持并推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施放重重烟幕，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贩卖“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在斗争中学习列宁对折中主义批判的历史经验，对于划清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 录

前 言	1
一、列宁揭露伯恩斯坦派的“游蛇”伎俩	1
(一)修正主义必然要搞折中主义	2
(二)“回到康德去”——宣扬“开倒车”的折中主义口号	8
(三)用折中主义残羹剩汁杂拌起来的俄国马赫主义	13
二、列宁戳穿考茨基的“中派”面目	18
(一)“中派”=机会主义的奴仆	19
(二)无耻地歪曲辩证法，是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	26
(三)折中主义诡辩伎俩，掩盖不了叛徒的嘴脸	32
三、列宁批判布哈林的二元论	37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岂容折中主义败坏	38
(二)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不容歪曲	42
(三)“平衡论”岂能冒充辩证法	54
四、学习列宁对折中主义批判的经验	59
(一)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	59
(二)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决不允许搞调和	63
(三)决不容许用折中主义歪曲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65

一、列宁揭露伯恩施坦派的“游蛇”伎俩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①这个派别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火车司机的家庭。青年时代,多年在柏林一家银行当职员。他因受到资产阶级反对普鲁士君主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一些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一八七二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入党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一直没有得到改造。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拉萨尔和杜林的机会主义的忠实信徒。一八七八年,他因参加“苏黎世三人团”的叛卖活动,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斥责。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得以摆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监督,破门而出,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文章和演说,“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②。从此,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② 同上。

列宁指出，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手法，就是折中主义，即“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①。伯恩施坦就是用这种卑劣手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的“修正”。这种修正主义一出笼，便博得垄断资产阶级的欢心，各国机会主义者，也很快都集结到这面黑旗之下，称兄道弟，并共同喊着“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口号，向马克思主义发起猖狂进攻。顿时，浊浪滚滚，修正主义如同潮水一般泛滥成灾。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象一株挺立在高山之颠的劲松，顶住了修正主义的妖风浊浪，以叱咤风云、力挽狂澜的反潮流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反对修正主义的伟大旗手。

（一）修正主义必然要搞折中主义

一八九六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黑文。其中第一篇的题目就是《空想主义和折中主义》。文中攻击马克思主义有“空想”成分，极力鼓吹要用折中主义来“检查”马克思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499页。

这个“精神武器”。这篇毒文是他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在这以后的一系列文章中，他处处标榜自己的任务就是借助于折中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批判性的清算”。他胡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缺乏系统的阐述”，犯了“独断主义”的错误，具有“片面性和夸大”。他吹嘘折中主义是一种“清醒的理智”，“是选择现象的种种说明及评价方式的方法”，要达到“对于整体的精密理解”，要理解社会“生活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形态，必须求助于综合或折中的方法”。如果对于折中主义“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伯恩施坦主义在各国的“兄弟”们，也都作着猴子式的模仿，小猴跟着大猴嚎，无不搞折中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折衷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经集结在爱·伯恩施坦周围了。”①

为什么修正主义一出笼就要耍弄折中主义呢？这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工人运动中的工贼，“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但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②。这种“形式上”和“客观上”的不一致，迫使修正主义者既要装出一副工人实际利益代表者的面孔，又要千方百计地引导工人运动适合资产阶级的私利；既要骗得工人群众的信任，更要博得资产阶级的欢心。因此，表面上公允，不偏不倚，就成了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伯恩施坦就是这样。他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58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

为了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便大肆鼓吹超阶级的“客观主义”，胡说什么现代社会“阶级的界限决没有严格的划定”，无产阶级“可以通过随便那一个人在政治上代表他”。他还胡说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指无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就会“主观”“片面”，而只有用折中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才能超脱阶级的局限，“保持着比较冷静的判断”。他极力宣扬“具有内在真理的理论将超越党派斗争之上”，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恰好只是在“它的原理也能够被每一个没有偏见和不受相反利益影响的非社会主义者赞成的时候”，甚至要被“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赞成的时候，“才是科学”。伯恩斯坦一方面用“社会主义”的言词蒙骗工人，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变成资产阶级“赞成”的东西。就这样，从根本上抽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和斗争化为乌有，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它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修正主义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它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乞灵于折中主义，因为折中主义正具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这些特征。修正主义者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为了拼凑他们的反动体系，也决定他们必然要借助折中主义。因为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迷惑人的。伯恩斯坦体系就是用折中主义拼凑起来的大杂烩。为了替这种修正主义体系造舆论，以欺骗广大群众，伯恩斯坦大肆宣扬：“一切理论都是狭窄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资产阶级学说之间“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他恬不知耻地把折中主义比做是“在生活的花园里”“到处偷吃的花花公子”。而他为了寻求“科学思想”，就不得不“偷偷地向折中主义者”“借钱”。显然，伯恩斯坦诡称的“综合”方法，就是东偷西窃的折中主义。向折中主义“借钱”，就是为了偷梁换柱，以假乱真，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偷运资产阶级的黑货。伯恩斯坦自供：“我的话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在这个长长的“别人”名单上不仅有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和杜林这些伯恩斯坦的“老前辈”，而且有新的“学者”、“教授”，这就是朗格的新康德主义、柏姆·巴维克的“边际效用”论和“费边社”的改良主义等等。列宁指出：“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①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只不过是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流派、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学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到处抄袭、东拼西凑而成的大杂烩。“在折衷主义者看来，一切都是‘可以相容的’！”^②伯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92页。

恩施坦“跪着造反”，为了用各种陈旧的资产阶级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他的修正主义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故意抹杀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机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对立，伪造它们的“相似”和“一致”，公然扬言要“复活”蒲鲁东，“复活”拉萨尔“留给工人阶级的丰富的精神遗产。”伯恩施坦在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所写的序言中，就不惜歪曲历史，用折中主义的词句为拉萨尔翻案，说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意见并不全是正确的”，在策略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意见与其说同李卜克内西的意见“相近”，不如说同拉萨尔派的意见更为“相近”等等。列宁愤怒地指出，伯恩施坦写的序言，“一部分是空洞无物，一部分简直是捏造”，充满了“折衷主义的词句和攻击”，“除了掩盖和粉饰机会主义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①。列宁恢复了被伯恩施坦歪曲了的历史真相，指出马克思一八七五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末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②

修正主义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去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这就是他们的政策。伯恩施坦提出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这个反动纲领，最能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而为了掩盖这种反动实质，修正主义也总是借助折中主义，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混淆黑白。伯恩斯坦在解释他的所谓“运动就是一切”的基本内容和方针时说：“运动”就是指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训练”工人阶级“运用”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合法手段”来“改造国家制度”，通过“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使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使企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至于这些“运动”能否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那可以不管，只要有助于“社会进步”就行了！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是对无产阶级的彻底背叛。因为靠这种所谓“运动”，无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解放的，是不可能有什么“社会进步”的。伯恩斯坦就是用这套手法，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永远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列宁揭露说：“‘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①折中主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恰好适应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出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策需要。伯恩斯坦就是运用“既是这样”，“又是那样”的折中主义诡辩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①，这就是一切修正主义者实行的出卖革命原则性的所谓“灵活性”政策。他们“迁就”的都是次要的、细微的东西，“忘记”的则是重要的、根本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无原则性和折中态度，是修正主义的必然特征。

(二)“回到康德去”——宣扬“开倒车” 的折中主义口号

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斗争从来都是政治斗争的先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反动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伯恩斯坦就是这样。列宁指出：“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②

伯恩斯坦跟在新康德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屁股后面，高喊“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绝非偶然。因为，“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①当康德哲学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某种“自在之物”，认为“自在之物”是感觉的源泉时，它接近唯物主义。但它又认为人们只能认识“自在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本质；空间、时间、因果关系等范畴完全是先验的（先于经验的，人生来就有的）认识形式，从这一方面说，康德哲学又倒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康德哲学的两重性，反映了当时力量还很薄弱的德国资产阶级要想反抗封建君主制，又无力反抗的两面性。康德哲学的这种调和折中倾向，使它受到了从左、右两方面的批判。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日趋反动的德国资产阶级，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极端畏惧和仇恨的心理，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便出现了以朗格等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反动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从右的方面批判康德对“自在之物”的承认，力图复活康德哲学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的糟粕，宣扬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一出笼，就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马克思指出朗格哲学完全是“胡言乱语”^②。恩格斯指出，新康德主义和当时各式各样的折中主义一样，“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讽刺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就是继承了“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③。可是，伯恩施坦在一八九九年抛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修正主义的宣言书中，却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公然声称：“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如果我不是必须担心被人误解的话，我就把‘回到康德去’这句话翻译成‘回到朗格去’！”十分明显，伯恩施坦高喊“回到康德去”，就是要投到新康德主义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的怀抱里去，集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之大成，以此“修正”马克思主义。所以，就在一八九九年，当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看到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部大毒草时，便怒不可遏地写道：“书的内容越来越使我们吃惊。理论上太差了；而且是重复别人的话。光说批评，实际上连认真地进行独立的批评的尝试都没有。”^①

伯恩施坦派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标榜为“批判”，提出了“批评自由”这一时髦的口号，这完全是从康德那里抄袭来的。康德把他的哲学称为批判主义，他的主要哲学著作都标上“批判”这个词。实际上他的所谓“批判”，归根到底，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企图完成统一各派哲学的任务。伯恩施坦以及他的各家“兄弟”高喊“批评自由”，反对“思想僵化”，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就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学说“折中起来”，“统一”起来。列宁说，赫赫有名的“批评自由”，就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②。当时，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为了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把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241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1 页。

阶级运动限于只准进行经济斗争，反对建立一个新型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们接过“批评自由”的口号，妄图创造出一种既非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也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第三种”思想体系，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溶合起来”。譬如，他们闭口不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代之以“工人的社会和政治的自动性”这个含混词句。列宁痛斥了这些人的伪善面目，指出：“‘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①伯恩施坦派的所谓“批评自由”，就是“自由”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篡改马克思主义，抛弃任何完整的革命理论，以一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为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

由此可见，伯恩施坦高喊“回到康德去”的口号，是为了在哲学上“开倒车”，用唯心论代替唯物论，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而在哲学上“开倒车”，又是为他政治上开倒车服务的。首先，伯恩施坦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来论证他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谬论是正确的。他认为工人运动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是“连上帝本人也不知道的巅峰”，这是明目张胆地讨好资产阶级，出卖无产阶级。其次，伯恩施坦高喊“回到康德去”，是为了用庸俗进化论否认斗争、否认飞跃，妄图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而否认通过暴力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227页。

革命，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飞跃的革命理论。他攻击“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空想主义”。他提出了一整套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纲领，诬蔑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诬蔑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正如列宁一针见血指出的：“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就是为了“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①。

玩弄“游蛇”术，是伯恩施坦的“一技之长”，也是中外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用伎俩。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篡改马克思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一八九九年正当伯恩施坦从理论上完整提出了修正主义纲领之时，法国社会党右派头子米勒兰便在实践上作出了“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②。他以社会党人的身分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当上工商部长，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非合作，公然叛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改良法案欺骗工人，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并直接参与对内镇压工人罢工，对外扩军备战的勾当。米勒兰的叛卖行为把伯恩施坦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作出了“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

^② 同上书，第226页。

的最大尝试”^①。伯恩斯坦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作为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公开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狂热地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伯恩斯坦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说，用最恶毒的语言疯狂地诬蔑和咒骂苏维埃政权。伯恩斯坦派高喊“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实质岂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三)用折中主义残羹剩汁杂拌起来的俄国马赫主义

无独有偶。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在斯托雷平白色恐怖政策下，革命队伍中的“同路人”陷于动摇和腐化。“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②。以马尔托夫等人为代表的大部分孟什维克组成了“取消派”，要求取消各种形式的秘密斗争，实质上是要取消革命，取消党。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组成的“召回派”，要求党召回在杜马议会中的党团，反对党利用合法斗争去争取群众，聚集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无论“取消派”还是“召回派”，它们都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这些人和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之流相勾结，组成哲学上反动的统一战线，著书立说，仅在一九〇八年就连续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概论》等四本哲学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3页。

书，用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一场“讨伐”。他们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胡说“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是“神秘主义”，公然宣称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宗教”和“神”。面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列宁认为：“当前的任务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掘矿石，提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①

俄国的修正主义者为什么要用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是由他们的本性和马赫主义的特点所决定的。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西欧流行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是资产阶级教授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他们宣扬主观唯心主义，认为“整个世界是相互之间联系起来的感觉的一个复合”。马赫主义比之一般唯心主义更加隐蔽，更加狡猾。为了掩盖其哲学唯我论的实质，常常搬运一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披上“科学”的外衣，把自己打扮成“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把两种对立的观点机械地凑合起来。它明明是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理论，但却用虚伪的“无党性”来掩盖这种阶级属性，标榜自己是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没有“片面性”的“中派哲学”。正如列宁指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大杂烩”，它的“基本哲学前提是折衷主义的”^②。马赫主义的这些特点，颇有迷惑性，也正好适合俄国修正主义者“跪着造反”的需要，他们既要背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7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

叛革命，又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反动立场；他们要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但又要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他们拿不出独立的思想体系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于是只有乞灵于折中主义。波格丹诺夫说：“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了。”因此，他要用经验一元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又宣称“我不能承认自己在哲学上是一个马赫主义者。在总的哲学观点上，我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关于经验要素对‘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中立性的观念、关于这两种特性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联系观念”。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列宁说：“这正如一个信奉宗教的人说：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教徒，因为我从教徒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信仰上帝。波格丹诺夫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而这一点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错误，就是这整个哲学的基本错误。”^①马赫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制造一些空洞的、含糊不清的“中性的”名词术语，用以掩盖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暗中贩卖唯心主义货色。列宁指出，没有什么“中性的”抽象的“经验”，或者是唯物主义的经验，或者是唯心主义的经验。马赫主义妄图用“经验”来掩饰他们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这完全是徒劳的。马赫主义者还进一步臆造出“要素”这个模棱两可的术语来代替感觉。说什么“要素”是既非物质又非精神的“中性”东西，要人们相信他们的哲学的“全面性”，这是一种最可怜的诡辩。其实，“要素说”是“妄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目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2--53页。

唯心主义”^①。剥开画皮，它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而波格丹诺夫胡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意来说，是同等的，”“不可分离的”。列宁指出，这“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等同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等同的一样。”^③列宁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波格丹诺夫之流既讲唯心主义，又讲唯物主义，实际上贩卖唯心主义的丑恶嘴脸，说明了折中主义决不折中。

搞折中主义，必然鼓吹相对主义，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马赫主义者就自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便鹦鹉学舌，胡说：“马克思主义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相对主义是一种主观主义，它否定客观事物的规定性，否认事物之间质的差别，从根本上抹杀好与坏、新与旧、是与非、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对立，把一切认识都说成是相对的，它是折中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列宁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④。波格丹诺夫否定绝对真理，也就必然否定客观真理，为他们那种毫无革命气节的软体动物背叛革命的可耻行径作辩护。辩证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0页。

② 同上书，第331页。

③ 同上书，第329页。

④ 同上书，第136页。

法认为,相对和绝对是对立的统一。相对中有绝对,没有脱离绝对的相对。辩证法并不否认认识的相对性,但反对相对主义。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①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相对主义不承认绝对真理,必然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必然玩弄折中主义,必然导致唯心论和不可知论。

俄国马赫主义者鼓吹折中主义,这是出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企图以此维护沙皇反动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面对修正主义者的猖狂进攻,列宁以反潮流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宁愿四马分尸”^②,也决不和俄国马赫主义者妥协。在一九〇八年二月至十月,完成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光辉哲学著作的写作任务,从世界观上总结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经验,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二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形成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作了准备。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9页。

二、列宁戳穿考茨基的“中派”面目

伯恩施坦主义出笼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左派)，和修正主义流派(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考茨基则脚踏两只船，竭力标榜自己是超乎左派和右派之上的“中派”，摆出一副既不偏左，又不偏右的公允平正的架势，实际上偏袒右派，要左派服从右派。打着“中派”旗号的考茨基主义，是比伯恩施坦主义更精巧，更隐蔽，更虚伪的机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考茨基主义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危险。列宁称考茨基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①。彻底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是当时无产阶级面临的一项战斗任务。列宁写了一系列光辉著作戳穿了考茨基的“中派”面目，给它以毁灭性的打击。

卡尔·考茨基(1854年—1938年)，出生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大风暴把他卷入社会主义运动之中。一八七五年加入社会民主党。一八八〇年与伯恩施坦结成“莫逆之交”。一八八三年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主编，作了一些理论宣传工作，写过一些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但是，他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他不久便指出，考茨基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①，是一个纯粹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②。恩格斯逝世以后，他披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以第二国际“理论家”自居，戴着一副“中派”的假面具，成了第二国际中的“庞然大物”。正是他，为伯恩施坦提供了阵地，让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继而又小骂大帮忙，姑息纵容，为伯恩施坦撑腰打气；正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扮演牧师的角色，用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充当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又正是他，在十月革命后，丧心病狂地攻击十月革命，彻底堕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考茨基为什么会如此一步步地堕落下去呢？列宁指出：“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③这深刻地说明了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搞调和折中，发展下去，必然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走狗、机会主义的奴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一）“中派”=机会主义的奴仆

考茨基之所以开始能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到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1页。

② 同上书，第211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招摇撞骗，除了他写过一些所谓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之外，还因为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作过一番不痛不痒的假批判。考茨基迫于左派的压力，出于掩盖自己修正主义面目的需要，曾先后写了《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年）、《社会革命》（1902年）、《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等“论战”著作，口头上“气势汹汹”地向伯恩斯坦宣战，实际上却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向伯恩斯坦投降。对于考茨基的这个“假批判，真投降”的骗局，当时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列宁决定从这里开刀，剥去考茨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戳穿其“中派”的面目，揭露其同伯恩斯坦一丘之貉的反动实质。

列宁指出，考茨基在这三本著作中，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是折中主义，即所有“中庸的爱好者”所惯用的“回避主要论点”，“而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磨来磨去”^①的手法。而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则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列宁之所以抓住国家问题，揭露考茨基折中主义诡辩术，那是因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②无产阶级革命要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要不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在理论上，它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在实践上，它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分水岭。因此，抓住这个根本问题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批判修正主义，就抓住了要害，抓住了本质，就能识破修正主义的一切骗人鬼话。而考茨基的三本名曰“批判”的著作，却避而不谈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同时又故意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到第一位来颂扬，用枝节问题掩盖主要问题，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国家学说，“用折衷主义，用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任意（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强调前者或后者的办法把它们结合起来”^①。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背叛变节的作品”^②中，有意歪曲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基本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胡说什么，马克思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警告无产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等等。列宁严正指出：马克思的这段话的意思与伯恩施坦的解释“恰巧相反”，马克思是强调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打碎”、“摧毁”，“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④。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彻头彻尾地歪曲马克思主义，一声也不吭；对于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一字也不提。考茨基却别有用心地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87页。

② 同上书，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2页。

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来说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就这样，他用“一般说来”这一类抽象而模棱两可的词句，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轻巧地抹杀了，妄图把列宁同伯恩施坦的原则争论化为乌有。他还胡说什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因为“我们既不知道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在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它将怎样到来，是在一场大风暴或若干次突变中到来，还是在逐渐的、循序的实现中到来。我们也不知道在无产阶级统治初期的社会和无产阶级将是什么样子”。就这样，他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化成了“没有争论必要”的枝节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最根本之点，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因此，回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在枝节问题上兜圈子，这就是掩护机会主义，向机会主义屈膝投降，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

考茨基在理论上调和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为了在实践上掩护修正主义者的叛卖行为。一九〇〇年围绕法国社会党右派头子米勒兰入阁事件，左派和右派在第二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右派为之弹冠相庆，左派对之怒不可遏。在这重大路线斗争中，考茨基却公开亮出“中派”的杏黄旗，一面假惺惺表示不能象右派那样，把米勒兰入阁看作“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一面又在“但

是”后面大做文章，表示不能象左派那样，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所作所为看作是叛卖行为。顿时，妖雾迷惑了一些人的眼睛，使大会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决议草案，宣称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这个决议为机会主义政策留下了无数的空隙。当时，列宁领导的《曙光》杂志，把这个折中主义活标本讥之为“橡皮决议”。列宁还明确指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①。并针对考茨基的恶劣表演，指出考茨基主义就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缺乏清楚、肯定、明确的结论，摇摆不定”^②，在实际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考茨基在路线斗争中搞折中主义经常使用这样两手：一是借口灵活性，否定原则性；一是借口“统一”和“团结”，否定路线斗争不可调和性。考茨基的这两手，当时很有欺骗性。以卢森堡等为代表的德国党内的革命左派，在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由于“被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四面八方包围着”^③，也未能及时地与他彻底决裂。列宁在同考茨基主义斗争中，坚持反潮流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把锋利的解剖刀，剥开了考茨基不偏不倚、温良恭俭让的画皮，还其豺狼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3页。

的凶残面目。

考茨基把米勒兰事件硬说成只是一个不关紧要的策略问题，并声称“对于一个策略性问题”，只能如此。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策略观，列宁强调指出：必须严格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①。并指出策略的灵活性，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实行革命的原则性。因此，制订政策时，必须用“真正革命的观点”^②，把策略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联系起来。即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实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也是为了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完成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任务。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原则性是第一位的东西，是每一个革命者的出发点，策略灵活性必须服从革命原则性，决不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拿原则作交易。正如列宁经常教导的“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③。而考茨基同一切修正主义者，以策略灵活性否认革命原则性，从哲学上讲是以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抹杀和颠倒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从政治上讲，就是为了贩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贩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机会主义面目，百般狡辩说，他在米勒兰事件上炮制橡皮决议，“只是出于和解的意图，出于促成统一的意图”。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针对考茨基主义的这种所谓“团结”、“统一”的口号，列宁毫不含糊地回答：“统一，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② 同上书，第604页。

③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2—53页。

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①“当实际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时，要时常提防虚假的‘统一’”^②。这就是说，团结与统一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抽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内容，空喊“统一”和“团结”，就是用折中主义偷换辩证法，出卖革命原则，为“假团结、真分裂”制造烟幕弹。考茨基正是在“团结”与“统一”的烟幕下掩护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掩盖他同资产阶级的勾结、同机会主义猪狗们的拥抱、同国际无产阶级分裂的丑恶嘴脸。事实也完全如此。一九二二年，俄国的“中派”头子、考茨基的门徒托洛茨基，一方面纠集了俄国机会主义派别组成了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八月联盟”，一方面打出“非派别”旗号，高喊“统一”，攻击列宁是“分裂主义”。而考茨基一方面暗中资助孟什维克取消派，单独批准“八月联盟”加入第二国际；另一方面，在明里却装出一副“反对分裂，关心统一”的样子，要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合二而一。可见，机会主义者，“不管他喊统一喊得多么响亮，总是最恶毒的分裂分子！”^③他们高喊“统一”、“团结”之日，正是他们阴谋策划分裂之时。他们高喊“统一”、“团结”，是为了让修正主义吃掉马克思主义，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充当顺从机会主义的绵羊，最终统一到资产阶级怀抱里去。列宁指出：“考茨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9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8页。

基没有任何权利讲自己是不偏不倚的。”^①考茨基“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方面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修正主义采取调和折中的立场,发展下去,必然使自己最终堕入修正主义泥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这就是考茨基所走过的道路。所以,列宁给考茨基“中派”下了一个评语:“所谓‘中派’=机会主义者的奴仆。”^③这对于考茨基及其徒子徒孙们来说,是一个绝妙的画像!

(二)无耻地歪曲辩证法,是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

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很快都堕落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狂热吹鼓手。“中派”考茨基则以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为帝国主义战争涂脂抹粉。他在运用折中主义诡辩术,充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更加“突飞猛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④。

在大战期间,考茨基打着“公正”的旗号,表示既不同意左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也不同意右派把这次战争说成是“纯粹”民族性的;既不赞成左派无条件地反对这种战争的立场,又不赞成右派无条件地支持这种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49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64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第9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战争的立场。他大耍折中主义诡辩术，把这场战争歪曲成既是帝国主义性质又是民族性质。当德国议会表决军事拨款时，考茨基既不象右派那样公开投赞成票，也不象李卜克内西那样坚决投反对票，而是“弃权”。“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①一九一四年十月，针对考茨基的这种恶劣行径，列宁愤怒指出：“我现在最憎恨最鄙视的是考茨基”^②，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主义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因为，考茨基“想用诡辩和似乎是博学的废话来平息工人的已经觉醒了的心”^③。

为了戳穿考茨基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歪曲辩证法的伎俩，列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研究哲学史，研究辩证法，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特别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伟大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作了彻底揭露和批判。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矛盾调和论的典型，“浸透了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④。考茨基在时代问题上，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8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1页。

③ 同上书，第152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0页。

级斗争和阶级分析观点,不是去判定“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①。而是玩弄折中主义,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他用二元论,把帝国主义政策同帝国主义经济割裂开来,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与垄断资本的经济基础无关的资产阶级的一种对外“政策”,根本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他认为,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组织成为世界资本,组织统一的托拉斯,就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就能进入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就能实现“持久和平”。在这里,考茨基妄图用一个“超”字,把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统统化为乌有,真是荒谬之极!列宁指出:“不是暴露极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②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斗争是绝对的。只有“庸俗之辈”,才“企图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清除矛盾和斗争”^③。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发展规律,科学地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这个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更加尖锐起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是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1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1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此，无产阶级是这个时代的中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列宁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各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必然发生变化，必然要求重新分割已经分割完毕的世界。因此，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本质的；缓和是相对的、暂时的、虚假的。口头上高喊缓和，骨子里还是争夺，而且是为了更大的争夺。所以，帝国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也好，达成“协议”也好，不过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①。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的变换，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政治的继续，是它们斗争的表现形式。形式虽然不同，斗争的实质和内容没有变。而考茨基“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达成协议的形式”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②。由此可见，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要害，就是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矛盾，掩盖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否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为取悦于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辩护，在战争问题上玩弄折中主义诡辩术，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他的手法之一，就是“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例子来作证”^③。例如他分析战争问题时，装出一副精通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38页。

② 同上书，第796页。

③ 同上书，第627页。

史的面孔，大量引用巴黎公社前曾被马克思作过肯定的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战争的例子，作为“王牌”，提出社会民主党也应该“有条件”地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所进行的战争。这是有意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辩护。列宁指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①。马克思主义要求从迷离混沌的历史中，抓住阶级斗争这个指导性的线索，在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根据其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和作用大小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定。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而进行民族战争，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处于腐朽没落时期，为掠夺全世界、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是必须反对的。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上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评价用于评价现代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历史的歪曲，这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②，完全是反历史的、虚伪的和骗人的。

手法之二，就是以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为理由，抓住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战争的一点点民族因素，来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这是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辩护，对辩证法所作的无耻歪曲。马克思的辩证法绝“**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③。如果孤立地看，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战争是具有民族性。但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② 同上书，第628页。

③ 同上书，第642页。

考察,它在大战中只占百分之一的地位,对于大战性质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的意义。即使它加入的协约国一方取胜了,那末,协约国的大国仍然不可能让它获得民族解放的。所以,只讲现实的复杂性,不分析复杂的现象中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把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因素相提并论,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混为一谈,这种折中主义的做法,只能是帮助帝国主义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目的!

手法之三,就是以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界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①考茨基也在“转化”上大作文章,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说什么: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失利,国境被敌方侵入,那么人民出于“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幸福的感情”,“将坚决地反对入侵的敌人”。这样,战争对于统治阶级是具有帝国主义性的,对于人民来说则具有民族性的。所以,“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就这样,考茨基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篡改成各国无产阶级应该为“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互相残杀!考茨基的转化论与辩证法的转化论是丝毫不相容的。列宁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客观事物是可变的，然而具有质的稳定性的。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化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种条件是客观的，具体的，不是主观臆造的，抽象的。正是根据战争性质可以转化的辩证法，列宁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和战胜反革命战争的思想。考茨基之流，根本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辩证法的真理，不懂得区分两种战争的性质，从而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但是，革命的辩证法是不可战胜的，迅猛异常的革命暴风雨，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伟大的列宁，一方面运用辩证法这个批判的武器，揭露了考茨基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歪曲辩证法的叛徒嘴脸；一方面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英雄儿女，用武器的批判冲破了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纪元。

（三）折中主义诡辩伎俩，掩盖不了叛徒的嘴脸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对十月革命道路肯定还是否定，成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考茨基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如火焚身，再也按捺不住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心理，终于脱下“中派”的假面具，在反革命的大合唱中充当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12 页。

了主角。他接连抛出了每句话都充满“十足的叛徒精神”^①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通篇都是“喧嚷、喊叫、号哭和歇斯底里”^②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本反动小册子，以最肮脏的畜牲般的语言和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法，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恶毒攻击列宁和伟大的十月革命，彻底暴露了叛徒的狰狞面貌。

考茨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一方面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偶然用过的一个“词儿”，另一方面，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③，把“专政”解释成在“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的一种“管理状态”，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革命暴力。第二国际执行主席修正主义者王德威尔德与考茨基一呼一应，说什么：“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用含糊其词的“过渡”把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过渡”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的“过渡”，混为一谈。在一般“过渡”的概念下，把暴力革命来个釜底抽薪。所以，列宁指出：他们两个都是用“市侩折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论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④，“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東西”^⑤。他们的罪恶用心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

④ 同上书，第709页。

⑤ 同上书，第708页。

是否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以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理论。

考茨基极力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他大肆玩弄“多数”与“少数”的数字游戏，炮制了一个“超阶级”的“纯粹民主”。说什么：“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也保护少数派，因为民主意味着权利平等，人人都平等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和政党。”并捏造历史说，“保护少数”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传统”，无产阶级的前途全在于“扩大”这种民主，将它“贯彻到底”而已。

对于考茨基的这种反动谬论，列宁指出，考茨基“纯粹民主”的杰作“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的论调，而且是十足的空谈”^①。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和专政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它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任何国家总是对本阶级实行民主，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永远不会有脱离专政的“纯粹民主”。考茨基以“纯粹”作为“民主”的标签，抹杀民主的阶级性，是为了替资产阶级帮腔，欺骗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事实正是这样。就是这个口口声声高喊“纯粹民主”的考茨基，在德国资产阶级反动当局残杀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时，不仅没有丝毫的谴责，而且还竟然称刽子手谢德曼之流为“社会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为其开脱罪责，这正表明他是资产阶级豢养的走狗，是“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②。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页。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考茨基出于他的叛徒立场，还利用折中主义手法，抓住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妄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列宁运用辩证法的锐利武器，对考茨基之流否认革命新生事物的卑鄙论调作了有力地回击。

辩证法认为，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十全十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更不能够把它同反动的腐朽事物相比。因为，两者存在着本质区别。新生事物由于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因而它是不可战胜的，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俄国资产者攻击布尔什维克干了蠢事的时候，列宁形象而生动地比喻说，我们犯的错误等于是说了“二二得五”，它接近真理；而你们干的蠢事，却等于说了“二二得蜡烛”，简直荒谬透顶！所以，“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①列宁谆谆教导我们，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区分新旧事物的不同本质。无产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掘墓人，而且是革命的新生事物的育苗人，要“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②。考茨基之流正相反，他们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这是他们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96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反动立场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所决定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巩固革命成果所需要的时间比革命进程的时间要长得多，艰巨得多。这是因为一切反动阶级、反动派是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时刻都在梦想复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也证明了这条真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象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之流一样，沿用折中主义手法，不分革命与反革命，不讲主流与支流，不顾本质与现象，统统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横加攻击，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而对于腐朽的东西，则极力赞颂，象一群苍蝇围着一堆臭粪嗡嗡叫。但是，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新生事物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妄想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分子，总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下场，就是历史的铁证！

三、列宁批判布哈林的二元论

一九一六年，正当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鏖战的时候，那个刚刚爬上报刊发表文章的布哈林，就以自己的错误帮助考茨基主义者，列宁严厉批判了他伙同拉狄克炮制的许多谬论，并庄严宣告：“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①列宁在创建和巩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实践中，同混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布哈林之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1938年)，出身于莫斯科一个教师家庭，一九〇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七年混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三年以后窃取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要职，一九二六年又攫取了共产国际主席的头衔。布哈林一贯反对列宁主义路线。十月革命前，他反对列宁关于通过武装起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十月革命后，一九一八年，他伙同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关于同德签订布勒斯特和约的英明决策，并共同策划暗害革命导师列宁。在二十年代，他掩护托洛茨基反党分裂活动，鼓吹工团主义，歪曲和破坏列宁制订的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之后，他更是变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8页。

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消灭富农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八年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为什么能够在俄共党内钻得如此之深，爬得如此之高，隐藏达二十年之久呢？这同他在政治上惯耍两面派手法，哲学上善使折中主义诡辩术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上，他总是窥测风向，伺机而行，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与列宁对着干；一看苗头不对，便的风头上假装认输。在哲学上，他用折中主义二元论冒充马克思主义两点论，用平衡论偷换辩证法的重点论。他处处以“辩证学者”、“理论家”的面目出现，蛊惑人心，招摇撞骗。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深刻地指出：布哈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①。尽管布哈林之流“一百次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且以最激进的共产主义炫耀于人，但这种共产主义是一文不值的”^②。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岂容折中主义败坏

一切修正主义者，无不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暴露其叛徒嘴脸。布哈林也是这样。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布哈林及其一伙耍了一系列花招，有意混淆和抹杀帝国主义之间争夺霸权的非正义战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3页。

区别。他攻击列宁既反对第二国际提出的“保卫祖国”的骗人口号，又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是“二元论的宣传”。他还胡说：“我们决不愿意了解，怎么能既反对保卫祖国又主张自决，既反对祖国又保卫祖国。”针对布哈林的卑劣伎俩，列宁指出：布哈林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一元论，什么是二元论**”^①。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是要求人们抓住事物的真正实质。而“**真正实质**”几个字表明，必须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正的东西、表面和本质、言论和行动区别开来。”^②因此，要确定“保卫祖国”的实质，就必须区分“祖国”和战争的阶级内容。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要保卫自己“祖国”的利益，就必然要对内镇压本国人民，对外掠夺别国人民。所以，在帝国主义列强所进行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是掩饰非正义战争的骗人口号，第二国际鼓吹它，正是为了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扼杀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然而，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保卫祖国”，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所以它是正义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所以，“**我们认为打倒民族压迫的战争是合理的，我们同时又认为双方为了加强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合理的。**”^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科学的一元论。无产阶级一方面反对第二国际“保卫祖国”的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骗人口号，一方面又支持被压迫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保卫祖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同一目的。把这种科学的论断歪曲为“二元论”，完全暴露了布哈林之流对唯物辩证法的惊人无知。布哈林之流不对“祖国”作阶级分析，不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抽掉“保卫祖国”的阶级内容，把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混为一谈，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反一气，这就“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了起来”^①，这是不折不扣的折中主义。因此，布哈林之流的所谓“一元论”，才是道地的唯心主义“二元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国家就必然存在；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国家才会走向消亡。可是布哈林之流却煞有介事地反问：将来“国家”既然都要“消逝”，国界都要“打破”，无产阶级何必还要建立和保卫自己的国家呢？这完全是蓄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此，列宁回答说：无疑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但是，“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②。列宁并严正警告布哈林之流：“谁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或仅仅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配作社会民主党的党员”^③。列宁的教导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粉碎剥削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817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64 页。

的反抗，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必须有国家存在；而有国家存在，就要有国界。只有将来在全世界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国家才会自然消亡；既然那时国家都已消亡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国界存在了。

对于列宁的批评和警告，布哈林置若罔闻。而且，他用更狡猾的手法进行诡辩和反扑。一九一六年，他在《青年国际》杂志上化名发表反动文章，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胡说什么：“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先进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只是意味着退到旧技术，退到旧式企业。”这里布哈林用偷换概念的卑劣手法，继续为其反动谬论辩解。列宁指出：他明明提出的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有什么区别，“但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这样，布哈林就主观随意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主要差别”^①。即“我们主张(α)现在利用国家，并且(β)在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利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现在就对实践极其重要。(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点!)”^②布哈林用折中主义手法，阉割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妄图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步伐。然而，历史的洪流毕竟不可阻挡。伟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5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26页。

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光辉的现实。它宣告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同时也宣告了布哈林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彻底失败！

(二)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不容歪曲

一九一八年底，列宁总结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短短一年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新鲜经验，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①，并说，“**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②历史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机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用二元论混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布哈林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纠集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自称“共产主义者”，拚命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消亡”。布哈林为了替自己叛卖行为制造理论依据，在一九二〇年抛出了《过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② 同上。

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公然扬言要“推翻”“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过程的性质的概念”。

布哈林所要推翻的，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正是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教导，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进一步考察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俄国经济和政治，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②，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是说，从社会主义社会已具有共产主义因素这一点讲，它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它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斗争中谁胜谁负的问题，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才能真正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要“**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③。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所有“共产主义”的蓝图都是乌托邦，都是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6页。

布哈林在其名曰《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别有用心地“忘记了阶级斗争”^①，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必由之路，鼓吹“共产主义建设”“首先在于技术知识分子加入新的制度”，声称对资本家“强制实行剥夺”之后，便进入“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过程。对于布哈林的这种谬论，列宁讥讽说：这是给“混淆人的生的‘过程’和死的‘过程’‘找到了根据’！”^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对主要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在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历史条件造成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是始终必要的。它只能强化，不能消亡。布哈林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强化过程和消亡过程，其目的就是用“共产主义”漂亮的词句，掩盖正在复活着的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极需加强之时大肆鼓吹它的消亡，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打开方便之门。

列宁不仅透过布哈林的“漂亮的”言词还了他极右的面目，而且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挖了他的哲学根源。指出，布哈林是一个“被波格丹诺夫的折衷主义毒化了的作者”^③。布哈林本人也承认他的许多术语，都是“在波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48—49页。

格丹诺夫同志所用的‘涵义上’使用的”。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是以唯心主义和折中主义作为基础的。正因为布哈林拜其为师，必然在他的小册子中充满了“唯心主义地(在哲学思想上)、折衷主义地运用的术语”^①。布哈林正是由于跟在波格丹诺夫的屁股后面，在哲学的根本路线上，常常“倒悬在空中”^②，所以，他就必然用折中主义和“烦琐哲学把马克思的理论弄坏”^③，用一匙焦油弄臭马克思主义的一桶蜜。

一九二〇年底到一九二一年初在列宁同托洛茨基大论战中，布哈林又作了精彩的表演。他扮演“缓冲”角色，用折中主义歪曲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伙同托洛茨基，向列宁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当时，正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列车急转弯的时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在战争年代所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已成为巩固苏维埃政权非常迫切的任务，也是苏联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列宁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了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

这时，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以为有机可趁，便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首先跳出的是托洛茨基。他在一九二〇年底抛出了自称为“纲领性的小册子”——《论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66页。

③ 同上书，第12页。

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借工会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挑起了一场大论战。他鼓吹阶级斗争已“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形势的“整个实质就在于跨进了新的时代，即经济时代”、“生产时代”。他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完成“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造成“生产气氛”，“对生产全力以赴”。为此，他认为必须实行“拧紧螺丝钉”和“整刷工会”两项政策。所谓“拧紧螺丝钉”，就是用官僚主义的军事命令的手段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建立一种劳动者自己不能自由支配的劳动军人的制度”。所谓“整刷工会”，就是以整顿为名，按照修正主义路线的用人标准，对工会各级领导班子实行大换班。托洛茨基还提出了“工会国家化”的口号，要求把工会作为国家机关，把管理生产的职权交给工会，妄图取消党和无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领导作用。他们声称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并攻击列宁不关心生产。托洛茨基甚至露骨地叫嚷：我们“所树立的旗帜就是恢复经济的旗帜。”旗帜者，纲领也。在这里，托洛茨基公开打出了以经济为纲的旗号，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就在托洛茨基抛出这本小册子的前三天，列宁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精辟地指出：“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①。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阶级斗争作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②。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99页。

② 同上。

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①。可是，托洛茨基不仅公开提出以经济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而且还气势汹汹地提出要即将召开的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他的纲领和列宁的纲领作出抉择。面对托洛茨基掀起的逆风恶浪，列宁犹如中流砥柱；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抱病作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演说，给托洛茨基以迎头痛击，明确指出他“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②，并预言“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是会斥责并且否决这种政策的”^③。托洛茨基遭到列宁批判之后，色厉内荏地为自己辩解，说什么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则是“从经济上”看问题，把他挑起的两条路线斗争化成了看问题的方法之争，妄图滑脚溜走。

正在列宁抓住托洛茨基的要害给以回击的时候，布哈林却戴着“缓冲”的面目，粉墨登场了。他在列宁发表演说的同一个会上，摆出一副折中公允、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的架势，危言耸听地宣称：党内已经存在着一种象“火车有着某种倾覆的趋势”，急需“缓冲”一下。他纠集了十名中央委员，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缓冲集团”，抛出了一个“缓冲纲领”，声称列宁的“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的“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无论政治因素也好，经济因素也好，都不能丢掉。”因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83页。

② 同上书，第406页。

③ 同上书，第425页。

此，“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就这样，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①。为了替这种折中主义诡辩术寻找“逻辑上”的根据，布哈林在争论时举了一个玻璃杯的例子。他说：列宁同托洛茨基的争论，好比两个人互相争论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一个说是玻璃圆筒，一个说是饮具。其实，玻璃杯既是饮具又是圆筒，这样就全面，“无可争辩”了。布哈林就是用“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手法，来混淆原则斗争，欺骗群众。的确，当时也曾迷惑了一些人，使人看不清问题的真相，看不到布哈林比托洛茨基更狡猾、更危险。列宁说：“布哈林已经远远‘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②，为此，列宁继而发表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在批判托洛茨基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剥开了布哈林“缓冲”的画皮，指出他和托洛茨基是站在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向马克思主义进攻。

为了彻底批判布哈林歪曲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二元论，列宁抓住布哈林的“逻辑根据”进行深入的剖析，并“通俗地解释一下折衷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③。列宁指出，按照布哈林玻璃杯的逻辑，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玻璃杯的其他属性、特质、方面等等。如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来压纸，可以用来装捉到的蝴蝶。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2页。

璃杯可以作为带有雕刻或图画的艺术品。这种把一事物的许多属性不加分析地“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①,使人得不到要领。但是,唯物辩证法却与此相反。它“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②。而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就是要区分本质与现象,主要的和次要的,偶然的与必然的,得出对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列宁仍以玻璃杯为例指出,如果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是不是“圆筒形”,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洞,在使用时不要伤了嘴唇。如果需要玻璃杯只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就是杯子底上有洞,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那也是无碍于事的。因此,分析事物,不在于面面俱到,包罗万象,而要突出重点,全力找出并抓住整个链条中的主要环节,“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的、基本的问题”^③。然而,布哈林把政治与经济并列起来,“同等”看待,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④。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分析事物的矛盾,必须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了重点,抓住了本质。布哈林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说两者同等重要,不分主与次、纲与目、统帅与被统帅,这就用形而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② 同上书,第44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6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上学的均衡论偷换了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从而“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衷主义的规定”^①。

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折中主义二元论的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辟地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他深刻地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②。这就是说，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且主要表现为纲对目的统帅关系。政治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经济起着支配的作用。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大变革之后才有可能。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矛盾。一切反动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只有通过剧烈的阶级搏斗，破坏旧的上层建筑，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才能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论者；同时，又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必须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违背唯物论，而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于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3页。

② 同上书，第441页。

个斗争的成果”^①。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在俄国的门徒“经济派”所宣扬的“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谬论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深刻地指出：“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②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运用专政的力量对资本强行剥夺，无产阶级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地位。所以，布哈林宣扬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同等重要、互相结合，用折中主义二元论偷换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否认政治是统帅，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背叛。

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布哈林歪曲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否认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政治上“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③，揭露了布哈林的二元论的政治要害，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④所以，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占首位，也就是始终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在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3页。

④ 同上书，第370页。

位，作为统帅各项工作的总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资产阶级虽然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被根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不断再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必然把这种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在各条战线上坚持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②布哈林的折中主义“缓冲”术，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似乎没有什么倾向，实质上他的倾向性是很鲜明的。在托洛茨基提出修正主义纲领，猖狂向党挑战时，他保持沉默。可是当列宁刚予以回击时，他便大叫大嚷党有“倾复的趋势”，这正是从政治上配合托洛茨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另一种手法。列宁辛辣地讽刺布哈林的这种“缓冲”，就好像一个人拿了一桶煤油，往火上倒，还自称这是“缓冲煤油”，其实明明是火上加油。可见，修正主义否认阶级斗争为纲，仅仅是为了熄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他们所发动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进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

攻，从来也没有熄灭过。因此，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专政”^①！

最后，列宁撕下了托洛茨基、布哈林装出唯有他们才“关心生产”的假面纱，指出即使在经济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他们也“倒退了一步”^②，“是开倒车”^③。他们“关心生产”是假，破坏生产、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④ 政治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路线和方向。政治路线不对头，经济工作就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如果按照布哈林、托洛茨基那一套去搞，不仅生产搞不上去，而且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果也将付诸东流。

为了排除布哈林、托洛茨基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列宁领导俄共（布）同他们开展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共（布）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列宁拟定的纲领和决议，对这场大论战作了胜利的总结。全党在列宁主义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投入新的战斗。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10页。

② 同上书，第443页。

③ 同上书，第418页。

④ 同上书，第442页。

(三)“平衡论”岂能冒充辩证法

布哈林为了替他在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在政治上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制造理论依据，精心炮制了一个“平衡论”，并把它作为一条黑线，贯串在他的著作里。他恬不知耻地声称，他所发现的“平衡论”，是“非常重要”的，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狭小的场所”，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伟大发展”，是辩证法的理论“根据”，是“理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这完全是无耻谰言。

剥开布哈林的“平衡论”的画皮，它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翻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①“革命是一浪接一浪，不均匀，不平衡，不是永远一个式样的。”^②列宁在看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一开始就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好象斯宾塞??”^③当看到布哈林提出“从平衡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制度”，列宁便在这段话的边上打了一个大问号，并在评语中尖锐指出：这种说法“为哲学上从唯物主义倒向唯心主义的动摇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④。这样列宁就挖出了布哈林“平衡论”的老祖宗，点出了“平衡论”的实质。十九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是“平衡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79页。

③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1页。

④ 同上书，第46页。

“力的平衡”来解释整个宇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或者已经平衡或者正在走向平衡。一切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均衡状态。布哈林贩卖斯宾塞的黑货，却妄图鱼目混珠，作为他的“新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真是厚颜无耻！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更加猖獗。一九二九年，在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时期，布哈林刮起了“国民经济各种成分‘平衡’论”的妖风，把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资本主义成分），说成是好像两个木箱，沿着不同的轨道平行地、和平地向前移动，一旦它们相交的时候，就有了社会主义。布哈林刮起这股妖风，是为了反对进攻富农，反对实行农业集体化，反对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路线，明确指出“这种理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①，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了布哈林的“平衡论”。一九三七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光辉哲学著作，不仅从哲学高度清算了我们党内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也批判了布哈林之流所鼓吹的“平衡论”，为我们划清折中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界限提供了最锐利的武器。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②而“平衡论”则认为平衡是正常状态，不平衡是反常状态。按照这种观点看问题，事物的诸种因素中没有主与次、大与小、重点与一般、主流与支流、现象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41页。

②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88页。

与本质之别，谁要作这种区别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布哈林就说什么：“把重要问题看成为主要之问题者，那就等于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枪身与枪机究竟那个重要呢？左手同右手谁重要？钟表的发条和钟表的齿轮……究竟又谁算是最主要的呢？”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不能将诸种矛盾平均看待。不仅如此，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其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起着主导的作用。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本质。只有分清事物的主要之点，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反之，如果不分主次，就必然“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①。

布哈林所鼓吹的折中主义的“平衡论”必然导致调和论和外因论。他认为“社会与自然间的平衡之性质足以规定社会演化的根本倾向。”他并且煞有介事地反问：除了机械运动，“辩证法所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正是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他胡说国家是来自社会外部的“平衡的附加条件”，是“团结阶级的圈儿”。“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统一因素越来越压倒对立因素。”这样，就把平衡变为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把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归诸于外因，从而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笔勾销。不仅如此，他还荒谬绝伦的提出工人阶级可以同富农建立联盟，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也“可以逐渐缓和下来，到后来旧时的资产阶级逐渐与无产阶级混

^①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79页。

合”，便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完全是合二而一论，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把社会主义合到资本主义那里，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与“平衡论”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因此，矛盾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有时似乎出现势均力敌的状况，但那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②。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而且存在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③在有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始终存在；在无阶级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永远不会完结。因此，“平衡论”是违反客观实际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恶劣变种，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④布哈林正是这样的一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②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46页。

④ 同上书，第95—96页。

个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

乌鸦的翅膀岂能遮住金色的太阳，折中主义“平衡论”岂能遮盖唯物辩证法的不朽光芒。在革命的征途上，我们要反复批判折中主义“平衡论”，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精心研究“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①，永做革命的促进派。

^①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88页。

四、学习列宁对折中主义批判的经验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折中主义的批判，是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等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是怎样利用折中主义，打着“超党派”、“超阶级”、“超政治”的幌子，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学习列宁对折中主义的批判，对我们今天胜利地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

列宁教导我们说：“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大基本派别。全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哲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它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②。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般是进步阶级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一般则是反动阶

^{①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

级的世界观。哲学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先导。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是要坚持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伯恩施坦、考茨基、布哈林之流，为了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总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基础，千方百计歪曲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虚弱本性，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这一点。于是，就标榜他们的哲学是一种“超越”和“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无党派”的“新”体系，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伎俩。列宁在和伯恩施坦、考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斗争中，彻底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指出，在阶级的社会里，超阶级的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修正主义者妄图否认哲学的党性原则，“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完全是骗人的把戏！

列宁指出：“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①修正主义者把自己的理论装扮成“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之上，但是他们在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时总是和唯心主义携起手来，把唯物主义作为攻击的唯一对手。他们搞调和，就是要用唯心论吃掉唯物论，用形而上学吃掉辩证法，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吃掉无产阶级世界观。

列宁强调指出：在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②。一切修正主义者总是打着“批判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妄图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最完备的科学世界观搞得四分五裂，然后任意地东抽一点，西拿一点，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伯恩斯坦将新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一体”；考茨基宣扬“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布哈林则把斯宾塞的“均衡论”原封不动地拿过来，算作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贡献”。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是这样，我国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是这样。陈独秀就曾公开鼓吹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能合作一条统一战线”，他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彼此以“我的朋友”相称，结果踏着工农的鲜血，“联合”到蒋介石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

② 同上书，第332—333页。

石反革命旗帜下去了，终于是奴才。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竭力鼓吹腐朽的“孔孟之道”，鼓吹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什么“先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统统都成为他们手中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刘少奇抛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合二而一论”，林彪的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也都无不饱浸着折中主义的毒汁。他们一个个都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滚到革命的对立面，这都是为历史的事实所证实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告诫全党：“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①。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针对刘少奇一伙同资产阶级“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②的投降行径，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辩证法认为，一切矛盾斗争都是不可调和的。放弃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搞折中调和，就是背叛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就是投降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最科学最全面的概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7页。

②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第10页。

③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5—6页。

括。我们一定要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决不允许搞调和

列宁战斗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却竭力搞阶级调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议论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呢？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①他们鼓吹折中主义就是为了搞阶级调和。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自己打扮成是“超阶级”的，不偏不倚的，“凌驾”于工人和资产阶级之上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实际上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②。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调和论或阶级斗争熄灭论，正是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手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他们宣扬阶级调和，是为了迷惑工人阶级，使他们逆来顺受，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血腥统治；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他们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了麻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使他们丧失警惕，以便复辟资本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153页。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列宁坚持了斗争哲学，并教导说：“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①无产阶级要“贯彻自己的路线”，就必须“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②。疾风知劲草。在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都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象潮水般涌来时，列宁不怕孤立，坚持斗争，顶住反动逆流，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修正主义，并战而胜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始终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当考茨基以“中派”自居，用“统一”、“团结”、“策略灵活性”等等骗人的口号，妄图调和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列宁对他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当布哈林组织所谓“缓冲集团”，掩护托洛茨基向党进攻时，列宁把他的做法比作“缓冲煤油”，指出“布哈林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③。正是由于列宁对伯恩施坦、考茨基、布哈林等修正主义者作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修正主义的进攻，才夺取和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就告诉我们，在路线斗争中，“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骑墙派”总是倾向一边的。谁在路线斗争中搞折中主义，谁就势必充当资产阶级奴才，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页。

路线，也是在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始终坚定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敢于反潮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进攻，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敢于反潮流，敢于和一切错误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革命航船不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三) 决不容许用折中主义歪曲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玩弄的折中主义时，十分强调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这决不是偶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①修正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歪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叫嚷“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斗争都更加切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

实可贵”，妄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引入歧途，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针对这种恶意的宣传，列宁指出：“沙皇说：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①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修正主义者颠倒和歪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为了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使资本主义得以复辟。针对这种卑鄙的行径，列宁指出，我们要搞好经济建设，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但是，“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②。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借口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的原理，歪曲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否定政治是统帅。他们果真不讲政治吗？列宁戳穿了他们的骗局，指出他们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③ 向无产阶级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用资产阶级政治代替无产阶级政治，用修正主义路线取代马克思主义路线，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可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上台之后便变本加厉地推行老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那一套，胡说“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

① 《列宁全集》第9卷，第43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4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9页。

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属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土上全面复辟，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是值得每个革命者永远记取的！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也无不歪曲和颠倒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彭德怀叫嚷政治与经济“两者必须并重”；刘少奇鼓吹“经济建设中心论”，大搞物质刺激；林彪宣扬“政治重要，经济也重要”，“政治与业务轮流突出”；而邓小平则借口政治与经济“互相联系，不能分割”，不讲政治与业务“谁大谁小，谁管谁”，把发展经济提到纲的位置，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从他们的丑恶表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颠倒和歪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同时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以此煽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一个是用资产阶级经济主义蛊惑人心，妄图诱使广大群众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是这样干的，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也是这样干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抓革命，促生产”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一系列指示，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经济，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粉碎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最近，毛主席又针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

线,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修正主义纲领,也是折中主义的活标本。邓小平大搞修正主义,用“四个现代化”和“科学文化落后”的矛盾,“安定”与“不安定”的矛盾,取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他用二元论代替辩证法,大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妄图一口气刮掉无产阶级专政,让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卷土重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无情地揭露了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深刻地总结了全党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始终是一切工作的总纲,修正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玩弄折中主义歪曲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要害,是要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篡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否定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否定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我们今天仍然处于这个时代。反修斗争是长期的战斗任务,折中主义的妖雾还会不断重来。修正主义玩弄折中主义完全是故伎重演。但故伎重演决不是简单重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修正主义

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必然越来越圆滑，越来越富于欺骗性。我们要识破它，就必须借助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识破修正主义者玩弄的折中主义诡辩术，及时战胜他们。为此，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点中国哲学史，读点鲁迅著作，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不断改造世界观，练就一副火眼金睛，为消灭一切害人虫，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